

杨连宁 / 著

戒急

成功的变革其实最平静

我已经老了，我最怕自己被推进焚尸炉时，没有心，没有脑，只有一副下水和手脚。因而，我不能仅为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权力与利益，不识真假，不论是非、不辨善恶、不分美丑、不知荣辱地苟活着。

改革头上悬着激进之剑，
我们能否跳出历史周期律？

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怎样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被读者誉为

“眼光毒、文笔俊”的资深作家

杨连宁

以这部厚积薄发之作，赢得学界名家

平秦贲凡璋
功立玺
江萧徐章解

鼎力推荐

戒急

成功的变革其实最平静

杨连宁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戒急：成功的变革其实最平静 / 杨连宁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7
ISBN 978-7-5060-6561-0

I. ①戒… II. ①杨… III. ①社会问题—研究—中国 IV. ①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8248 号

戒急：成功的变革其实最平静

(JIEJI: CHENGGONG DE BIANGE QISHI ZUIPINGJING)

作 者：杨连宁

责任编辑：徐 玲 李治华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5 000 册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15.25

字 数：219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6561-0

定 价：39.00 元

发行电话：(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5210012

A 篇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泥足深陷的周期律 / 003

百代未遂的富强梦 / 010

梦碎在民贫民弱上 / 017

人治的“阿喀琉斯之踵” / 021

“民治、民有、民享”还是“官治、官有、官享”？ / 025

摔了跤的“超常规、跨越式” / 032

惹祸的官本位、权力本位 / 038

贪腐撩拨激进怒火 / 044

一个幽灵在游荡 / 051

安危之间，岂容行差踏错？ / 061

B 篇

过犹不及，激进比保守
更容易变馊

鸡蛋撞石墙也有涓滴效应 / 069

官民岂能恶性互动 / 076

争利益须先争权利 / 083

不为“红豆汤”出卖“长子权” / 092

想“均富”反倒被“均贫” / 099

为了穷人反倒害了穷人 / 106

路在何方？路在农民的“自我革命” / 113

C 篇

化险为夷，拆除引爆 火药桶的雷管

- 子弹乱飞了一个世纪 / 123
- 以暴易暴是一剂毒药 / 132
- 是什么让我曾经成为一个暴徒？ / 140
- 为什么说暴徒都是蠢汉？ / 151
- 绵延不绝的冷暴力 / 160
- “学费”昂贵，不能再虚掷 / 165
- 我们不能没有历史地活着 / 170
- 降解自己体内的历史残毒 / 175

D 篇

戒急用忍，最深刻的变革 也许最宁静

- 蜜蜂不会只在自家田里授粉 / 185
- 追求楼高车快不难，追求现代文明不易 / 190
- 当心绊倒在熟悉的路上 / 198
- 反腐败其实并不难 / 206
- 从分享公产权益入手，制约公权力 / 212
- 让政治光谱宽广一些 / 218
- 社会变革历来没有直通车 / 223
- 和平转型已不可逆转 / 229

后记：多余的话 / 237

A 篇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

泥足深陷的周期律

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
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
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黑格尔

只有终日被灰霾笼罩着，你才会格外珍惜新鲜空气，对吧？这就像历经过战乱的老人，全都格外珍惜太平日子一样。所以，当听到前任总理温家宝在 2012 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发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的警告，我脊背一阵发凉；看到“重庆事件”重演了“文革”常见的“红得发紫、紫得发黑”的一幕，我的脊背又一阵发凉；等看到游行的青年打出“跪求政府开战”“宁可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的横幅时，我的心里都拔凉拔凉的啦！拜赐这 37 年来的和平岁月，中国人好不容易过上了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生活，难道有人喝得不止二两了，又想回到战乱年代去吗？

遥想当年，酒鬼李白刚出道时，粉丝里有暗中跟他较劲的，把自己的名字都改成李赤了。赤者红也，我们就称李赤为红公子。1250 年前的这位红公子喜欢极端体验，每当过腻了太平日子，就

一个国家是民众由于对邻国的共同厌恶以及对自己历史的共同曲解而团结起来组成的。

——提摩许·加顿·艾什

要找一点儿刺激。有一天与几位朋友结伴出城春游，落座在一户“农家乐”里准备吃饭；搭讪上一位女子还没说几句话呢，已有家室的红公子就已经跟人家订婚啦！朋友正在劝他，他起身去解手就一去不返了。忽听有人连声惊叫，大家慌忙循声奔去，只见红公子头在下，脚在上，倒插在粪桶里。他被拽了出来，浇了几桶冷水，终于活转了过来。大家以为他是被“厕鬼”拉下去的，可红公子却坚称是自己跳下去的，谁信呢？

然而不信也得信。吃完饭回城的半路上，大家又几次发现他不见了。几次找来找去，原来他又倒插在粪桶里。大家七手八脚地又把他拽了出来，然后，又然后……第四次就没有然后了。怎么救也救不活他，红公子的极限运动终于结束了。这事儿除了《酉阳杂俎》有记载之外，柳宗元写的《李赤传》也强调：“李赤之传不诬也。”所以，这事儿尽管听着不靠谱，我们也信。

王小波在世时用过这个典故，借以说明“太平年月与乱世的区别，比新鲜空气和臭屎的区别还要大”：“这些年我们过着太平日子，好比呼吸到了一点新鲜空气，没理由再把我们栽进臭屎里。我是中国的国民，我对这个国家的希望就是：希望这里永远是太平年月。不管海外的学人怎么说我们庸俗，丧失了左派的锐气，我这个见解终不肯改。”

我发现王小波的见解，与汉唐文人“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见解，穿越历史“庸俗”到一堆儿了。你看得出来，“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不过是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罢了。谁都不难想见，即便是太平年月，当一条狗的滋味也不好受，跟做牛做马一样，都要为主人效犬马之劳。宁效犬马之劳也不去乱世做人，足以可见乱世的可怕，是能把人的出息都吓没的。

跟王小波同龄，我也是乱世的历险者与幸存者，至今痛并后怕着。所谓乱世，一般指社会冲突失控失序，升级为暴力对抗。社会争端不受政府控制，不依靠制度与法律解决，通常祸起于公

中国人全都像饿死鬼投胎的。……中国人是灾民。……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朝代，一个是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朝代。

——鲁迅

权力不公与政府失信，也即俗话说的“官逼民反”；也有“文革”这样不寻常的，它不是官逼民反，而是“奉旨造反、动员造反”的，但仍旧没有例外：民反都起因于官。

中国历史上的乱世，据我所知，也无非就是“底层动员，造反夺权”那一套儿，或者跟我当红卫兵时像个暴徒，充当了马前卒一样。“暴力与骚乱事件的根源，在于无序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亨廷顿语）。嗜血嗜权的对抗与冲突会殃及每一个人，正是乱世可怕之所在，也是让我们这些亲历者创巨痛深的昨夜噩梦。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是人类历史上杀戮率最高的人种，应当称之为“戮民”。从人口历史曲线的波动，可以看出中国人口消灭的频仍。公元前 21 世纪的夏禹时代，中国有 1350 多万人，战国末年减至 1200 多万人。汉初人口回升为 3000 万，汉平帝元始二年达到过 5959 万人，三国之乱后再度锐减。明末清初的战乱，令 1661 年的人口仅为 2107 万，回升至康乾时代开始突破 1 亿。据梁启超、余天休统计，从秦统一到 1929 年的 2140 年间，国家规模的战乱发生过 160 次，累计时间有 896 年，平均每 3 年中就有 1 年战乱。攻伐征剿，杀戮不停。从公元前 206 年的西汉到 1908 年溥仪登基前，历代皇帝 208 人，平均寿命 38 岁，其中三分之一死于非命，父子相弑，兄弟阋于墙是家常便饭。上层都如此薄命，老百姓能不生灵涂炭？

所以说，曾经被浪费过生命的上百代人，能过上太平日子都属于劫后余生。对于年过六旬的我来说，劫后余生的太平日子也越过越少了；因而，谁还愿意再次充当“造反夺权”的炮灰，虚掷弥足珍贵的生命残值呢？

再说了，为了保护自己的智商与人格不被羞辱，我也不能两次跳进同一个坑里。为什么？因为英文有俗语说：你骗我一次是你的耻辱，你骗我两次就是我的耻辱了（Cheat me once - shame

on you! Cheat me twice – shame on me)！这句话解释开了就是，我年轻时被骗是我二了，被你无耻地滥用了我的信任；倘若步入老年还二次被骗，不是自己真二还能是什么呢？

你也看出来了，不愿再次去乱世历险，全因我惜命胜过惜金——蝼蚁尚且贪生，世世代代殒命于乱世的中国人已如恒河沙数了，再添上些尾数似乎也轻如鸿毛，谁又愿意去充当大雁的毛呢？当然了，历史上中国人的深戒恐惧，绝不限于乱世的热暴力，太平日子也挨鞭子、挨板子，冷暴力之下也没有真正的安宁日子。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长期生活在官府的棍棒牢狱威胁之下，以恐怖作为统治手段的专制主义，同样造成中国人的惶恐与不安全感。但话说回来，汉唐就有了“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一说，表明对热暴力的深戒恐惧，对冷暴力的无奈承受，强汉盛唐时代就已经非常强烈了。奇怪吗？不奇怪。史实能够证明，汉唐两代的治乱相循，早已跟“新鲜空气和臭屎的区别”一样鲜明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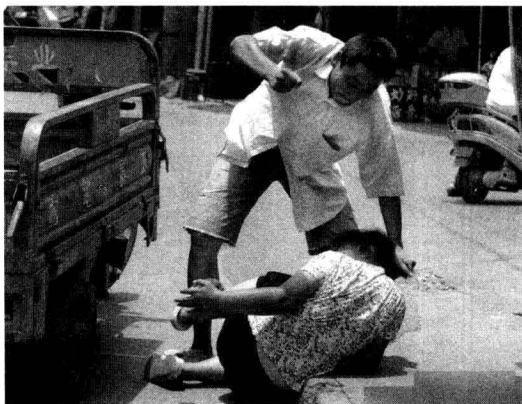
如今我们讲民族复兴，有着回溯历史盛世的含义。强汉盛唐，无疑是最令中国人追忆的。但说来你别不信，这两个朝代，其实没有今人从后视镜里看得那么光鲜：史上号称强盛的这两个朝代，战乱一点儿也不比太平年月少，热暴力一点儿也不比冷暴力少。冷冰冰的统计数据显示，这两个朝代动荡年份与承平年份的比例，大致也各占 50%——难怪汉唐时代就有了“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无奈选择呢。这也就是说，即便是后人憧憬的强汉盛唐，仍旧是在“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治乱周期里打滚的，更遑论各朝各代了。

历代王朝中兴时开疆拓土、横征暴敛、大兴土木，不免制造出“兴，百姓苦”；政权衰落时内战四起、抓兵拉伕、颠沛流离，又会制造出“亡，百姓苦”。有了这个治世与乱世盛衰交替的周期，才会有老百姓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中国也才有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百慕大漩涡与魔咒。

生命体带着行为闯入时间，历史也就发生了；在创造历史方面，中国人不但不遑多让，还屡屡伏尸百万、血流千里呢，然而黑格尔竟敢小看中国，说中国没有历史。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深究一下你发现，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是他看出了古代中国“有一部时间久得发霉的历史”，它周而复始、没有多大进步。因而，他说的没有历史，是指过往历史虽也惊心动魄，典籍也汗牛充栋，但实质上已经烂熟到顶，腐烂退化，亟待更新了。

除了“城头变幻大王旗”（鲁迅语），也即政权易手之外，历代的农民造反总是空开花不结果的。也就是说，虽然官民博弈每次都有输有赢，都要推倒重砌，但中国人打牌的规则总是老一套，始终没有更新——“在传统中国，农民革命通常是为重振某个覆灭王朝而斗争，力求恢复本质上大同小异的社会秩序”（摩尔语）。破多立少甚至有破无立的政权易手，怎么可能产生进步呢？

“百代皆行秦政制”。血缘宗法的君主制“家天下”，具有超稳定的整合修复能力，也具有超强的抗异拒变能力。因而，每一代打江山、坐江山的造反派，哪怕异族也罢，无一例外都服膺了这套制度文化。这些靠劫富济贫扯旗子、拉杆子的侠盗，又被招安进来坐上龙椅，成为龙的传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些使一个文明兴起的原则/主义，往往就是使它衰亡的原则/主义”（汤因比语）。“中国的传统体制太合理了，以至它对于现代社会的应变力几乎等于零”（亨廷顿语）。及至近代，丧失了适应力更新力的这套规程模式，拖累中国龙像一条恐龙化石那样难以进化。以致我们不得不



夫妻间也通行丛林法则吗？

承认，中国人沿袭的若干低等生存法则（譬如恃强凌弱的丛林山寨法则，氏族“土围子”法则、内亲外疏法则、主奴人身依附法则等），颇有土著民族史前野蛮的残留。

承认自己不开化不文明，是中国人迄今都难启齿的一桩事。我们自认为强汉盛唐的文明天下领先，遗传有“自国中心主义”的优越感，一向视周边的“东蛮”、“西夷”、“南戎”、“北狄”为有待归化的蛮族。当西方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与全人类共同利益，成为引领地球文明的火车头之后，国门被打开，打破了自我感觉良好的自闭心理。被惩罚的中国人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并不开化并不文明，决意“追欧揖美，旧邦新造”（孙中山语）。因而，由不认输、不服气驱动的民族复兴运动，成为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旋律。“一贯的世界主义者变成了民族主义者，是理解近代中国人性格的一把钥匙”（黑格尔语）。

已经像离不开空气那样，如今中国人离不开汽车火车飞机电视电脑手机浴盆马桶燃气炉，离不开法院超市银行卡网络游戏，也离不开黄校车与PM2.5的检测了。过惯了“交通基本靠飞机，通讯基本靠手机，看病基本靠西医，发言基本靠麦克，会议基本靠投影，文件基本靠电脑，管理基本靠探头，文凭基本靠4级，水平基本靠英语，呼吸基本靠空调，游戏基本靠网络，娱乐基本靠伟哥”的“全盘西化”日子，谁也不愿重返柴禾灶煮饭，土炕上睡觉，豆油点灯，牲畜圈里拉屎，井中汲水，河里洗澡，背着成串的铜钱步行20里赶集或骑驴进城，没有内衣内裤卫生纸，没有牙刷牙膏刮脸刀，没有纸币更没有银行卡的旧社会，重过“照明基本靠油，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取暖基本靠抖，自娱基本靠手，解闷基本靠烟，快乐基本靠酒”的“全盘中化”日子，对不对？但“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谁又能像胡适那样，“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上都不如人”呢？

你有那么多人，
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
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
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
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
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
你像个什么样呢？
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
球籍！

——毛泽东

承认科技落后可以拜师学艺，承认政治、道德落后怎么办？与日本人“始惊、次醉、终狂”地以敌为师不一样，中国人一直觉得“以我为主”“中体西用”是个精明的选择，却忘了有个自我难以更新、难以进步的周期律在那里，大小进步都得学习西方。譬如，我们自诩中国人的家庭亲情比西方人浓厚，却不料“啃老”“坑老”也比西方浓厚，内亲外疏的不公平也比西方浓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风更比西方浓厚。怎么办？学不学西方人扔掉拐杖，让孩子自幼独立呢？又譬如，接送孩子的黄校车，检验空气品质的PM2.5，都可以学习西方，那财权收缴到议会，约束政府的收税权与预算权，学不学西方呢？流浪收容的强制，精神疾病收治的强制，都可以学西方改成自愿救助，那么，户籍制度、劳教制度的废除呢？是见贤思齐还是急功近利？你发现我们陷入的这些纠结太多也太久了，一句话，我们能够秉持那种“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荫”（陆机语）的立场吗？

一个疲惫至极的人，有人牵来一匹马他还不骑，只因为马的颜色，不是他心爱的色彩。

——英谚

百代未遂的富强梦

人的自由度大小，才是一个国家盛衰的关键。

——袁伟时

进步已今非昔比，世人也刮目相看：中国这 37 年来的巨大进步，与过往历史不可同日而语。经济的成功起飞，是在“主导产权、控制命脉、垄断资源、占领上游、支配关键、掌握要素”的“政府经济特权和官商利益共同体的垄断”（杨小凯语）之下实现的。这表明一个权威治理体制，是“不发达国家追赶现代化的必要阶段，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必要过渡”（萧功秦语）。但时移势易，这种依靠权力配置资源与财富的体制，眼下已经走到了亟待变革的关口。

为什么？因为与看似“民富国穷”的西方国家相比，与那些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而不是聚财于政府的现代国家相比，说中国当下“国富民穷、城富乡穷、官富民穷”也不过分——我国已跃居世界最大债权国、最大贸易顺差国、最大外汇储备国与经济规模第二大国了，不能说国不富；可国内人均工资与 GNI（人均国民总收入）不但分别排名世界 100 位之后，而且，平均工资所

占人均 GDP 水平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 43%，GNI 则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 40%，这不能说民不穷。

有人用“国企强则国强”的模式，挑战“民富则国强”的普遍法则，显然是有悖史实、有悖常识的强词夺理。民富则国强的，世界上比比皆是，而靠垄断国企富强起来的国家，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为什么民富才能国强？因为任何经济体的财富创造，只能源自企业竞争力和大众“生产消费者”（奎恩语）。企业竞争力不强而国家强大，老百姓贫弱而国家富强的，谁听说过？离开微观细胞的活力，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强盛；迄今为止的世界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富却民穷的国家能够真正崛起的例子。

谁都知道，在一个权力支配财富的体制下，决策错误造成的资源浪费比贪污更可怕。我们常说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做坏事，而好制度能防止坏人做坏事；大众对于贪腐的敏感，远远大于对制度性缺陷的敏感。其实，制度缺陷造成的资源错配与贫富不均，远比官员贪贿严重。譬如“我国钢铁产能过剩高达 2 亿吨，按照每吨产能投资 5000 元计，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浪费已达 1 万亿元之多了”（成思危语）。因而，在一个半管制、半市场，半人治、半法治，半垄断、半竞争，半短缺、半过剩的过渡体制之下，“政府经济特权”和“官商利益共同体的垄断”（杨小凯语），“通货膨胀被用于壮大国家资本”（刘易斯语），国家主导的投资完全压倒了民众主导的消费等现象，所造成有亲有疏的苦乐不均，远比贪腐严重。

陈志武说，现在害中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鼓吹中国模式有多么好，让中国人飘飘然不思改进。世界上所有的富强国家，为什么都是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而不是聚财于政府的？因为任何国家的富强，只能够建立在企业竞争力强大、大众消费能力强大之上。因而，国强只是民富的自然结果，离开民富去追求国强像是拔苗助长。拔苗助长的例子也不是没有，与我国一江之隔的那

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

——卡尔·马克思

个邻国就是；他们把“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军国主义改版为“没有糖果可以活下去，没有子弹一天也不能生存”的先军政治，实行吃不饱穿不暖的穷兵黷武主义。放眼望去，古今中外那些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国家，根基脆弱的泥足巨人国家，都是这类例子。

就说世世代代梦想的“富国强兵”吧。虽然推出这个变法的商鞅本人，下场够吓人的，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几乎没有哪个朝代不是以此为国策的，对吧？秦以后更迭过 30 个朝代，始皇帝之后更迭过 231 个皇帝，宗法专制制度上仍都是萧规曹随、大同小异的。富国强兵的大梦，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地一直在做，为什么总也不得其门而入？答案明摆着，商鞅的“重农抑商、奖励耕战”，用取消经济自由的准军事化政制来追求富国强兵，能不碰壁吗？

“重农抑商”取消了市场自由，“奖励耕战”又鼓动了暴力攫掠，你不妨穿越一下，这个不要市场要暴力的政策导向，像不像来到了“文革”中？或者说，“文革”时取消市场又实行全民皆兵，像不像重演了“重农抑商、奖励耕战”？稍微穿越一下，你一眼就能看穿历史隧道里的铁幕：取消了经济自由又动辄穷兵黷武，正是历朝历代求富求强而不得的两大误区。穿越回来，你也能看穿现实，中国这些年与富强渐行渐近，是我们告别了全民皆兵，恢复了市场自由的结果，不是吗？

历史上富国强兵梦屡屡碰壁，是有统计数字佐证的：两千多年来貌似强盛的盛世，所占年份的比例连 20% 都不到，其余超过 80% 的年份，都是国弱兵败的凋敝朝代，败于骑猎游牧民族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越到晚近，越是凋敝不堪，离富国强兵的梦想越远；譬如辽金夏、元蒙与满清各代，败绩史基本上就是一部被征服史，一连串败绩缀成了一根历史下降线。

及至近现代，则内战之频仍，对外依恃之重，杀伐之厉，饿殍之众，搜刮攫掠之广，颠沛流离之远，冤狱冤魂之多，出身